

中国权力政治的

规则和潜规则

中国两千年来自阳儒阴法权力政治的奥秘

韩非子《法、术、势》政治思想千年历史解读

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

揭示中国古代社会陷入兴亡周期循环怪圈的答案

历代君王驭民修身之术 培养领导者洞彻事务本质的视野和眼光

王權論

Monarchal Power: An Analysis

李劍宏／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Monarchal Power: An Analysis

李剑宏 / 著

王權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王 权 论

著 者 / 李剑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责任校对 / 李秀军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8.5

字 数 / 375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881 - 1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部深刻解析中国 王权政治的经典力作（序一）

金太军*

欣闻李剑宏所著《王权论》一书即将出版，我十分高兴。李剑宏是一名勤奋博学的青年学者，早在1999年的时候，就创办了以学术研究为宗旨的剑虹评论网，一直保持着和社科人文领域学者们的交流和对话。近十年来，他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学，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凭借“少年老成”的人生履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开始了独立创建“中和”学术思想体系的研究之路。众所周知，独立研究学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之路，不仅缺少必要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必需的课题研究资金，即便完成了研究成果，在市场为导向的出版条件下，书稿也很难发表出来。所幸的是，李剑宏克服了这些困难。最令人欣慰的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审题委员会肯定了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了审题专家的远见卓识，对于从事学术创新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王权论》作为李剑宏“中和”学术思想体系研究成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十年磨一剑”的扛鼎力作之一。起初约有八十余万字，几次删繁就简后，浓缩成三十余万字，但篇幅的缩减没有影响作者的思想表达，相反，言简意赅的文字更有“微言大义”的意味。本书观点新颖、论证深刻、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是一部深入解析中国王权政治的经典之作。作者透过先秦法家韩非子“法、术、势”的权力政治思想，以犀利独

* 金太军，1963年生，苏州大学校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管理科学》等刊编委。中山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到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王权政治统治的奥秘与造成近代中国落后西方的根源，钩玄提要出中国古人治国理乱的智慧思想，在分析了王权政治产生的种种弊端之后，提出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命题——如何解决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政治难题，引导读者得出中国必须走民主和法治道路的结论。

《王权论》一书令人耳目一新，关键在于独特新颖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体例，以及作者的独到见解。

第一，《王权论》一书透过韩非子思想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症结。

法家思想注重实践精神，不仅为中国王权政治如何运用权力提炼出了一般性的规律认识，还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办法，最契合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皇帝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法家思想，诚如本书作者在绪论中所言：“但凡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地方，法家思想揭示的规律就必然起作用。”

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国人，他虽出生高贵，却放弃富贵荣华，做了一名清苦的政治思想家。这样的人生设计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相反，造就了他一生的失意困顿和怀才不遇，最后在被人轻视和陷害中凄凉死去。在死后的数千年间，他依然背负骂名，至今，一些学者仍把他视为中国极权政治的祸首。因为遭人轻视，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他的准确出生年月；《史记》记载他是韩国的贵公子，但他和韩国王室血缘关系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他原本和先秦的其他诸子一样，被后世尊称为“韩子”，但唐宋以后，人们开始叫他“韩非子”，正如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这恐怕是中国唯一一个被后世人修改了尊称的思想家吧。人们没有将孔子改为孔丘子，而把韩子改为韩非子，看得出对他的轻视。”这位被人轻视的政治思想家，青年时曾拜荀子为师，与李斯成为同学。他立志学成富国强兵的真实学问，报效内忧外患的韩国，但学成归国时，却不受国君重用。时为秦王的嬴政在阅读了韩非子文章后，惊叹他的大才，不惜发动一场战争强迫韩国将他送到秦国，但他的同学——时为秦国丞相的李斯却怀着嫉妒心设计毒杀了他，《史记》记其事为公元前 233 年。本书第一章对此段故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读者不妨留意。

据《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五》记载：韩非子“疾治国不

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这说明：韩非子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善秩序作为他的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提出“抱法（运用法律制度治理国家）”、“处势（君王集中国家一切最高政治权力）”、“用术（掌握组织和驾驭官员的办法）”的政治主张，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君权和法权合一的“理想国”，实现国家富强。

执行阳儒阴法政治路线的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像儒家知识分子那样轻视韩非子及其代表的法家思想，甚至可以说，韩非子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是名副其实的千古帝王师。譬如汉宣帝曾训诫太子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七《汉纪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这里所提的“霸道”，就包含着法家的主张。又如三国时期以“仁义”著称于世的汉昭烈皇帝刘备，在白帝城给太子刘禅的遗诏中曾特意列出一个读书单：“可读《汉书》、《礼记》、闲暇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明达。”（《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这里面的《商君书》、申、韩，即是法家人物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著作。

因为法家思想真正指导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是王权政治的“内核”，所以，本书把韩非子思想还原到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下，再把这种思想和当时的政治现实相对照，使读者通过韩非子思想一点点地揭开了王权政治统治的神秘面纱。作者选取这个独特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很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可谓鞭辟入里。

第二，《王权论》一书深刻揭示了君主集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原则和方法，指出专制政治造成“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锁定）”的局面，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王权论》深刻揭示了王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在本书第二章，作者从“有力者王”的自然法则出发，将法家提出的人之天性“趋利避害”作为王权政治的人性论基础，指出人民之所以服从君王一人的统治，是由于

君王的政治权力垂直垄断了社会一切资源，对人民的切身利益有绝对的予夺之权。“人的天性在他不能抗拒这股力的时候，也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趋利避害的时候，就会选择服从，于是行为朝着掌权者的意志方向进行。”

基于这样的政治逻辑，王权政治找到了具有“排他性”、“独占性”特征的专制统治原则——“二柄”，即予夺人民利害的强制力。中国古代君王为了巩固和运用这种专制权力，采用了毋借权柄、心藏不漏、形名参同、赏信罚必、众端参观、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手段；十分警惕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庙攻于外等情况；努力掌握任人唯贤、精通经济、分权制衡、打击政敌、铲除奸党等本领；不断加强把握大局、高瞻远瞩、团结同志、自胜自制、收束野心、艰苦奋斗、自我保护、虚心纳谏、自强自立、谦虚谨慎等政治素质；竭力消除业已形成气候的明劫、事劫、刑劫等政治变局。

《王权论》第三、四章，不惜用十余万字的笔墨，对君王巩固和运用权力的上述办法作了条分缕析的深刻解析和评价，同时配合生动有趣的史料，对帝王心术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也从中提炼了对现代社会有益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对政治学而言，除了要对权力运用或者说是权力控制进行研究以外，还要研究政治的首要问题——如何产生政治权力，或者说如何产生掌握和行使权力的统治者。作者在论述韩非子提出的“自然之势”时指出：“在韩非子所处的时代，‘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度已经成为历史，‘汤武革命’不具有可操作性，各国国君皆以血统关系世袭权力。在这种态势下，承认‘自然之势’，就是承认以血统关系世袭权力的政治现实。”（《王权论》第二章）寥寥数语，就把王权政治以嫡长子继承制作为权力产生方式的现实必然性勾勒出来。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古代统治者选择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更深刻的动机——专制政治要求权力独占，虽然嫡长子继承制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好的选择。当嫡长子继承制成为最高政治权力产生的不二选择时，论证这种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权力具有合法性，必然借助于肯定宗法制度的儒家思想。这事实上说明：王权社会对宗法制度及其思想采取了既利用又妥协的策略，以此稳固自身的政治稳定。

王权政治主宰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君主专制统治一代高过一代，专制统治手法一代比一代精巧，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下，“有力者王”的专制政治精密地控制了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李剑宏在《民权论》（目前尚未出版的手稿）一书中，为民权政治提炼出“力量制衡产生秩序世界”的自然法理依据，这就凸显了王权政治以“有力者王”作为自然法理依据的政治局限性。“有力者王”固然是可成立的真理，但孤立的真理并不是真正的真理——“现在的情况是，地球不得不绕着太阳转动，但地球绝不会撞向太阳。如果宇宙仅仅是‘有力者王’的天下，而没有相互制衡的力，那么宇宙在自我毁灭，绝不会产生秩序和生命。同样，在人类社会，当政治以绝对权力控制社会的时候，也面临着某种不可预期的毁灭结局。”（李剑宏《民权论》手稿）在《王权论》前言部分，作者分析说：专制王权政治“虽成功禁锢社会发展的脚步，因而免于社会变革对政治统治的威胁，却不可避免地崩溃于农业社会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历代王朝，要么被奋起反抗的失地农民所推翻，要么被野蛮落后的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王权政治制造的‘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局面，造成中国历史始终摆脱不了一乱一治的兴亡周期律怪圈，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裹足不前的农业文明形态中”。“由于政治对社会的长期禁锢，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民主、法治、科学、经济等领域极度落后于西方”。

面对专制政治必然造成“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政治难题，执政者无论励精图治还是苟且偷安，民众耽于逸乐还是忧患未来，均不能获得进步。这就要求统治者变革政治，“首先要打破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措施、经济政策，才能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有当社会能够反制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定程序决定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政策时，政治权力和社会的发展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以上两段引用出自《王权论》第七章）

李剑宏在《王权论》中的这些结论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应当说，自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正是在走着一条不断释放社会活力和生机的道路，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正在令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变得自由、多元，国家和社会正逐步走向良性互动。

第三,《王权论》一书重新划分了中国的社会形态,提出了人的三种属性,构建了“思想—事实”的二元解释框架。

以往,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形态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提法。李剑宏在《王权论》绪论部分中大胆质疑中国是否有过奴隶社会,自秦到清朝的中国社会是否属于“封建”范畴。他按照“国家主权归谁行使”的标准,创造性地提出宗法社会(“指夏、商、周时期,国家权力由大大小小的宗族掌握”)、王权社会(“指自秦朝开始至清朝终结的历史阶段,国家权力由君王一人掌握,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民权社会(“指1912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的中华民国历史,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共和政体建立。”“实际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军阀割据政治和半殖民地政治”,“由于其共和政体是以民权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故暂且将这一段历史称为‘民权社会’”)的概念。这些质疑和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李剑宏在《王权论》绪论部分对人的属性问题创造性地引入“精神属性”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自然和社会两大属性,但并不否认意识(精神)是人区别于地球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作者在学术研究中认为,除了承认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属性之外,人还有建立在这两种客观属性之上的第三种属性——精神属性,这种精神属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升华,是人区别并高于地球其他生物的独特属性;人的精神属性,主要表现为理性,客观上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一观点颇有新意。

基于人的三种属性的认识,李剑宏在《王权论》绪论中提出了对人类历史采取“思想—事实”的二元解释框架。因为人的精神属性是建立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上的,精神属性只能制约而不能决定人的自然与社会属性,那么在人类政治和社会领域,“思想—事实”的二元存在并不是承认哲学上的心物二元论,而是承认精神具有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当失败者退出历史舞台时,纵然肉体已经消灭,但他的思想意志并不会随之死去,并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复活——某些时候的复活甚至是必然的”,思想具有“稳定传承、指导实践和超越时空的特点”,“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政治现象,背后都有不同思想意志的斗争和妥协”,“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政治思想不仅能解释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呈现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也能解释和规定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的

主要的、多数的政治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事实”的二元解释框架，作者选取韩非子思想作为考察王权政治时代的思想标本；在对历史问题进行政治研究时，注意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在思想观念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客观事实）比较中，逐步揭示了王权政治的本质与内容。

第四，《王权论》一书所体现的许多独到见解，系作者在长期钻研中提炼而成，因而显得深刻而富有学术价值。

这些深刻独到的分析俯拾皆是。比如《王权论》第一章第二节，作者运用社会学家科赛“知识与权力”的理论工具，结合自己的“智慧塔”分析模型来寻找权力和思想的两种内在关系，深刻论证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儒家意识形态在中国王权社会的确立过程。在《王权论》第二章，作者在逐一分析了孔子、孟子、荀子、《黄帝内经》和韩非子的人性观之后，对荀子的“人性恶”观点提出了悖论，认为从“人性恶”不能必然地推出人可以“化性起伪”，还提出善恶不应当成为分析人性的定性词汇，“‘善’与‘恶’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从根本而言，这两个概念不过是人从自身立场出发的价值判断而已。”“善恶是趋利避害的天性在环境作用下的结果。”在《王权论》第五至七章，作者逐一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清谈之风、谏官之弊、告密恶习、文字狱之害；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的释法用术、官官相护、酷吏当道、亲亲互隐、法分等级、心诛腹诽现象；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如何以思想、政治、经济手段精密地控制社会和人民。在作这些流弊的分析时，有破有立、贯通中西、旁征博引、引入鲜为人知的典型史料，使这些鞭挞性的批判并没有流于空泛的道德教条，而是从国家治乱的政治角度理性分析这些弊害，使结论扎实而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除此之外，作者善于将艰深的理论用深入浅出的文字予以表达，独具匠心地将各种文言史料用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进行表述，在我们轻松地阅读一个个故事的同时，已经“不经意”地理解了原本枯燥晦涩的政治理论，甚至在阅读作者每一节前的“题记”和每一章最后一节的“主客对话”中，“不自觉”地保持了和作者思维的同步交流与共振，这使得即便只有中等学力的读者也能通读本书，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文字驾驭水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用沉稳洗练而不失生动活泼的笔法为读者呈献了原

汁原味的儒、法、道、墨的基本政治思想，并融入现代政治学观点予以分析，这对于国学和政治知识的普及是有益的。《王权论》充满了智慧精警之语，阅读时，你可能需要一支笔，随时准备圈点，甚至击节而叹。

我希望：融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创新性为一体的《王权论》的出版，能为李剑宏后续的学术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的社会应当鼓励青年学者从事学术创新事业，一个勇于创新的民族，才能不断进步、兴旺发达。作为一名中青年学者，我本人愿意与李剑宏及诸位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仁共勉。是为序。

直面“国家和社会 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序二）

蒋国华*

我的好朋友——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科学学和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马凯博士曾说过一句名言：“政治是关于权力和谁行使权力的学问。”从语义学上讲，中国古代有关“政治”的含义，与西方古希腊的“政治”含义原是迥然不同的，但在近当代，特别是自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以来，“政治”在中国便开始了融入世界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伟大历程。

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盛唐的开国帝王，其所谓“兴替”，指的就是王朝权力的获得、丧失、转换和易位。换句话说，古今中外，政治表现的社会现象是一样的，从来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表现为人们夺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所谓政治，本质上就成了获得、保持、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

在我国，翻开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描述为一种帝王和大臣们赢得政权、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史。而李剑宏耗费多年心血写成的《王权论》一书，穿透历史表象，讲述了中国古代帝王如何以精巧的办法严密地管理国家与人民，却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道理，揭示了王权政治巩固和运用权力的内在政治规律与矛盾。真正的学问，尽管在讲述历史，却自有其不可泯灭的“古今之通义”。

* 蒋国华，1944年生，民进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民进十二届北京市秘书长，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吉利大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研究所所长。

读《王权论》之前，我们要深思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政治，一定逃脱不了韩非子主张的政治？要知道，在战国时期，中国正在大分裂，但政治束缚不了自由流动的思想。为什么百家争鸣之中，唯独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皇帝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来当作统治手段的法宝？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让君主集权政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之久？如果我们当代的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只是在道德上盲目痛斥，把中国古人走过的几千年政治道路都用“专制黑暗、野蛮落后”等词语抹煞掉，却没有一个人认认真真地、深入地读一读法家的思想，就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下有些学者对西方文明和历史如数家珍，甚至认为中世纪的黑暗也是西方文明兴盛之前的“必要的恶”，却对自己古老祖国的文明和历史弃之如敝屣，这种躲在象牙塔里面附庸风雅和追赶时髦的“学者病”着实害人不浅。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会让我们犯削足适履的毛病。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曾说：“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为一切之解释。”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心理，今日之中国乃是过去之中国的演进，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无法割断历史，斩断传统。你想割断历史，历史的反作用力更大；你想斩断传统，传统的反弹力量更甚。我们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与传统，才能最少阻力地找到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根和涅槃强盛之路。

《王权论》试图从“理性的权力”和“权力的理性”的视角出发，帮助人们认清历史与传统。作者的研究兴趣是以政治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君主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政治现象。换言之，透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来研究王权政治体系的存在条件，解开了君主集权政治何以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难题。作者以结构的、宏观的、历史的、比较的和定性的研究方式，着重研究了王权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了王权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王权政治的社会根源、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王权政治对社会的作用，以及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政治权威又怎样凝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等重大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的地缘状态是产生君主专制的直接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产生君主专制的内在动力。在此立论基础上，作者把君主集权

政治的统治逻辑、原理、原则和办法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从思想观念、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多个角度、层面，探讨了王权政治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

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提出的“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可谓是《王权论》这本书中最璀璨夺目的思想奇葩。《王权论》开篇第一章，即以秦王朝兴亡为历史考察对象，得出三个结论：一、划时代意义的商鞅变法先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而被历史形势迫成；二、秦王朝的灭亡是不受约束的王权造成的，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这一政治问题；三、秦王朝的灭亡虽然揭示了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最本质的政治原因，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秦政”体制。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政治和知识合流，形成阳儒阴法的意识形态，君王的统治手法越来越精巧。

于是，强力而精密的政治给社会发展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社会的发展一旦超越这个界限，政治就出来干预。中国政治不仅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还决定了社会的结构与运动。正如作者在第七章所说：“当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国家锁死了社会；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来又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会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这一论点深刻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存在和中国历史始终处于一乱一治却没有政治和社会文明突破的答案。

在我看来，作者在第七章创造性地提出三个观点：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结构决定了王权政治体系的客观存在。

二、当王权政治体系试图禁锢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异以维系自身存在的时候，它必须使政治和社会之间形成封闭的、自组织性的、坚固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它必须对维系这个政治体系的同盟者予以利益共享，从而实现政治共治。我们可以透过第七章深刻地窥见到王权政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三、一旦社会发展裹足不前，政治变革就会失去内在动力，社会文明就无法产生质的飞跃。

这些观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即便在当今世界，政治和社会

的关系仍是各国政治家十分头疼的问题。如何让政治和社会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又能促进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王权论》给了很有特色的启示和思路。

除此之外,本书还具有可读性的特点。作者在提出概念时由浅入深,在学术结构上层层相扣,在援引史料时前后照应,在表述观点时中西结合。因为由浅入深地提出概念,读者阅读时丝毫不感到费力;因为层层相扣的组织结构,读者对作者的思想表达有清晰理解;因为史料前后照应,读者不会对这些史料感觉突兀而陌生;因为观点中西结合,使读者在比较中有了更深入思考。这体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写作手法、深厚扎实的理论根基和炉火纯青的文字驾驭功底,使《王权论》一书同时具备了学术思想研究价值和可读性价值。

我们常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古往今来,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驾驭这个动力的是各级各类“第一把手”。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科学地遴选、管理和监控“第一把手”,将是新世纪乃至新千年中世界人民最艰巨也是最伟大的目标。因此,李剑宏先生《王权论》的出版是件好事,《资治通鉴》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我们当代人而言,吸取历史的教训,才能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好的借鉴。

洞察人性的 领袖管理艺术（序三）

杨劲伟*

《王权论》是一部建构在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深入研究领袖管理艺术的力作。本书入木三分地展现了中国五千年雄奇瑰伟的政治写意画卷，条分缕析地论述了中国历代君王治国、理乱、驭臣、修身之道，系统全面地解析了中国古典权力政治学的原理和观点，切中肯綮地抓住了王权政治统治的核心精髓和根本要害。读罢此书，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斗争游戏变得洞若观火、纤维毕现。因此，扣人心弦、益人心智且引人深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本书能比这一本更让你得到真正的政治学问与智慧。

这本书告诉我们：“政治的成功智慧与从政艺术，不应该只对雄心勃勃的政界人士有价值，其中包含的人类永恒的真理，足以令每个人受益。”如果说，人类天性中确实有一些超越历史、阶级和社会而亘古不变的东西，那么，建立在这些人性本质认识之上的思想就会闪耀人类永恒的真理。掌握了这些经得起人心、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思维方法，才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各行业组织的卓越领袖，才有能力在各行业组织中开展卓有成效的管理和变革工作。

请注意我的措辞，我指的是各行业组织的领袖而非一般的管理者。领袖和管理者的境界判若霄壤：领袖除了要关注整个经济环境、政治形势以及人们的内心需求，还要凝聚全部的心血灌注到自己所领导的事业之中，确保事业的正确方向。管理者则关注在某一系统内具体的项目实施，力求

* 杨劲伟，中国青年文化科技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华节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暨中青国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项目团队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正确地完成特定的绩效。正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所说：“把梯子正确地靠在墙上是管理的职责，领导的作用在于保证梯子靠在正确的墙上。”管理大师杜拉克则直截了当地说，领袖是做正确的事，管理者是正确地做事。

领袖会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甚至影响历史的进程。但一个人若想成为时代的“领跑者”，相当有难度和挑战性。作为一名领时代风气之先的领袖，没有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出人意料的创造。在过去一百年中，亨利·福特开创了人类的汽车时代；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扭转了美国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并在“二战”中令美国一跃而为世界霸主，彻底改变世界版图；比尔·盖茨的微软帝国发动了数字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和科学技术的进程。

只有具备了领袖的思维，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领袖，而要获得领袖的思维，必须借助于真正的学问。当下各类管理类书籍虽然层出不穷，却都偏重于具体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没有一本谈行业组织中的领袖如何思维与运筹帷幄，即便有所谓战略管理类书籍，也大多是基于某种理论分析模型构建而成。这些是知识，而非智慧；这些能“授人以鱼”，却不能“授人以渔”；这些是有益事业的具体微小的“术”，而非建立可大可久事业根基的“道”。如果我们对这些只鳞片爪的东西敬若神明，花费时间死记硬背，就和守株待兔的农夫一样，没有多大出息了。须知——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人会守着教条做成伟业。

由此可见，《王权论》贡献给读者的关键价值在于：培养我们一种洞彻事务本质的视野和眼光，给予我们一种科学、规律地看待历史、把握现实和辨别未来走向的思想方式，激发我们一种可以在变化无穷的环境中作出战略选择的决策能力。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如此广袤的知识海洋中，李剑宏所著的《王权论》从中提炼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养料。就我而言，中青国能独创和首倡的“绿海战略”，其核心的“绿海管理模式”至少受到书中以下启发：

一、既然“善恶是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在环境作用下的结果”（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对一个身处行业和组织中的领袖而言，必须防范人性中可能出现的恶，必须“设立正确的制度以晓明利害”（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所以，管理的前提是依靠制度约束人们不得从事有损组织利益的